

五险一金可以调,社保水平不宜降

■周俊生

时事聚焦

一轮降低社保缴费的大幕正在拉开。日前,上海市政府发布消息,决定下调养老、医疗和失业三个险种共计2.5%的单位缴费率,预计全市可在今年为企业减负135亿元。至此,国内已有7个省市出台了下调社保缴费的措施。

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是在经济增

速放缓、企业运行困难的背景下,为减轻企业负担作出的一项决策。“五险一金”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劳动制度改革后由国家规定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20多年来,这一制度日趋完善,但企业和职工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国社保缴费率的平均水平接近40%。在经济上升时期,这方面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矛盾便显现出来。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正是考虑了目前社会经济运行实际困难的一个务实措施。

但是,当政府开始以降低社保缴费的措施来为企业减负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原则,这就是社保缴费可降,但社会保障水平不能降低。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出越来越大,由于前期缴费的不足,特别是养老金省级统筹账户的局限,一些省份开始面临社保金入不敷出的问题。降低社保缴费,会使这部分地区社保基金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政府作出统筹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的步子不宜远

得太大,可以分阶段实施,像上海对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金的降幅分别为1%、1%和0.5%,就不至于对社保基金的缴存产生大的影响。政府负有向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责任,降低社保缴费,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更重的兜底责任。因此,降低社保缴费与加大财政对社保的支持要统筹考虑。在3月16日全国“两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对这两方面都作了阐述,一方面提出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下,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阶段性

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实施的是养老金省级统筹,省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多方筹集资金,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确实有突出困难的,只要地方政府尽力了,中央政府是会给予补助的。总理这番话为降低社保缴费解除了后顾之忧。而随着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推进,在全民参保、社保账户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改革措施落实以后,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来源:京华时报)

“对症下药” 帮扶贫困生就业

■敬一山

又到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季节。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贫困生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困难更为突出。3月20日,重庆市属国企为扶助数十所高校的7000多名贫困毕业生,150家国企针对性地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

据重庆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坚持人才供需双向选择,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贫困家庭大学生。”对于相对弱势的贫困生群体,这样的招聘理念无疑值得肯定。但这样的“优先”岗位,相对庞大的求职群体来说,可能还是杯水车薪,帮扶贫困生就业,还需要更多既符合市场规律,又能切合贫困生需求的措施。

相对于家境较好的学生来说,贫困生最大的两个求职短板,是信息和成本。前几年曾有媒体调查,贫困生求职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位居前列的是信息。现实地看,家境较好的学生通常意味着社会关系多,通过父辈亲友的眼界或者人脉,能够更及时准确地知道岗位信息。即便不考虑“走后门”这样的非正常现象,家境较好的学生,通常在求职信息获取上也占据优势。

所以高校或者政府部门要想帮助贫困生就业,首先可以努力的方向,也是搭建更多的桥梁,让贫困生能够更好地和用人单位对接,尽可能举办一些“贫困生就业专场”。让贫困生不用四处求索、花费太多的时间成本,就能获知更多的求职机会。

但事实上,这只是表层因素。如果贫困生和家境好的学生,在工作能力上真的处于“同等条件”,那么双方找工作的机会其实几乎是均等的,为什么贫困生还会感觉更加困难?本质的问题在于,现实中还存在很多隐形的歧视和潜规则。很多工作机会不是均等地给予所有的学生,各种关系影响之下,贫困生即便是工作能力均等,也被用人单位视为“次优选择”。所以如果贫困生确实存在就业更难的现象,说到底还是社会是否公平、游戏规则是否公正的问题。

就以国企来说,如果所有的招聘都是开放公开的,也就完全没必要对贫困生“优待”,所有人公平竞争就是。而政府该做的是打造公平的择业环境,尤其是对国企和事业单位,应通过严格的制度管控,消除可能的歧视或潜规则。

在学校教育的层面同样如此,不少学校在教育阶段存在“嫌贫爱富”嫌疑,在培养学生干部等层面,偏爱一些家境好、有关系的学生,使学生阶段在综合能力上就放大了“贫富差距”,在择业阶段当然就更难弥补。所以帮扶贫困生,功夫在平时,在教育环境、就业环境上消除各种隐性歧视,贫困生才能在就业时处于更公平的起点。这才是解决贫困生就业难题,消除阶层固化的治本之策。(来源:广州日报)



人海战术

每天在医院周边游荡,收集患者信息给“老大”,“老大”组织数十名“枪手”用手机软件抢号。一个原本7元、9元、14元的专家号,经过层层转手,最终以数百元、数千元“成交”……一个其自称“龙商会”的号贩子团伙日前被北京警方破获,其头目声称拥有能“秒杀”网上号源的“神秘武器”,网罗一批号贩子以加价几倍到十几倍的高价兜售空军总医院各种号源,一个利用人海战术进行网络预约的号贩子“产业链”就此揭开。■新华社 朱慧卿

人才评价,再不能唯学历唯职称了

■谭敏

破解人才评价的难题,破除人才发展的制度樊篱,更好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激发人才活力,将为创新创业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作出全面部署。《意见》明确提出,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改进人才评价考核方式,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改革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好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能激发人才活力,释放人才红利,可是,不合理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却可能束缚人才发展,扼杀创造力。

长期以来,人才评价中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的倾向广受诟病,尤其是职称评定中,要求发表论文、参加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更是让不少人叫苦不迭。评职称必须发论文的要求不仅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年产论文最多的国家,论文造假抄袭乱象频出,还滋生出论文枪手、论文买卖、版面收费的黑色产业

链。此外,许多人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外语和计算机,为了评职称也不得不为“考试经济”作贡献,导致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著名作家铁流,为了评副高职称,英语和计算机连考12年未能过关。可是,对以写方块字为生的作家来说,会不会ABC真的能代表其专业能力的高低吗?五年级就辍学的英言,不懂英语,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能否认,职称评定的方式,在出台之初对于当时人才的选拔和使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过境迁,人才评定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在创新创业如火如荼的当下,改革人才评价考核方式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时代,许多科技精英都没有学历,更别说职称了。比尔·盖茨上大学一年后就退学创业,如果要追求学历,也许就没有今日的微软帝国;扎克伯格没有大学毕业,但却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也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现在的人才评价考核体系不再进行变革,将会严重挫伤人才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改变唯学历、唯职称的倾向,除了改变重学历轻能力、重资历轻业绩、重论文轻贡献、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标准外,还要解决谁来评价的问题。行政评价必须让位于专业评价。伯乐选对了,才能有千里马。事实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有了明确说法: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专业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企业内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等等。此次出台的《意见》,也明确“基础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突出市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强调社会评价。注重引入国际同行评价。应用型人才评价应根据职业特点突出能力和业绩导向”。这些可谓是慧眼识才的关键。评委选对了,才能保证人才评价的公平公正。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驱动力,破解人才评价的难题,破除人才发展的制度樊篱,更好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激发人才活力,也将为创新创业带来更广阔的空间那。

(来源:广州日报)

“就近入学案” 给教育部门提了醒

■刘晶瑶

据报道,家门口有个小学不能上,却要跑到一公里外,南京家长顾某很不服气,将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告上法庭。日前,备受关注的“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一案,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当庭做出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虽然原告败诉,但这起“就近入学”案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划片权”提出了质疑。二审原告提出对建邺区对学区划分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并对其他几个学区的划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法院认为,一则,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虽然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亦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但应注意到其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间;二则,当前确实或多或少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况,教育部门应尽可能在今后的学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广泛听取意见,提升合理性。

这起诉讼给教育部门如何均衡教育资源提了醒。教育资源的分配,历来牵动着国人的心。从“小升初”考试的“拼娃”入学,到“就近入学”的“拼爹”入学,每一次政策的改变,都会给学龄儿童家庭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如何分好义务教育阶段的蛋糕,成了教育部门职责任务的重中之重。

一般教育部门在学区房划定之初,会考虑到近几年适龄儿童的人数和学校招生人数的比例关系,制定周围哪些小区可以进入学区房名单,过一两年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略做调整,就会进入相对稳定期。毕竟,学区房如果变动太大,可能会造成部分家庭几年前的投资化为乌有——相同地理位置类似条件的隔壁的小区,因为有无学区房,每平方米房价可以相差上万,所以教育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会相对谨慎。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学区房的划分也未必就完全合情合理,例如“就近入学”案中顾某的孩子,就需要经过8条马路、8个红绿灯才能上学。

之所以让诸多学生家长万分纠结,病根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呈现出“马太效应”式的分布状态,资金、资源向少数优质学校集中,“豪华校”“重点校”强者恒强。正如教育部基础一司司长王定华所言,择校热需标本兼治。“首先要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试行区域均衡,同时通过学校联盟、集团化办学、划分大学区等方式,迅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这是根本之策。”

教育部门在制定就近入学政策时,不仅要严格查处择校乱象,堵住“条子生”“关系生”的口子,进一步压缩特长生录取的比例,让义务教育阶段的“义务”二字名副其实,更应该将学区划分上尽量做到公平公开,进一步推进学区确定的公开化、决策的科学化,杜绝暗箱操作的可能。(来源:新华每日电讯)